

前 言

沈 醉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我的一生就经历了热血青年——反革命刽子手——新中国公民这一漫长的历程。我由刽子手到新中国公民的转变过程曾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做了较详尽的叙述。而我在解放前 18 年中的活动虽在《文史资料》、《戴笠其人》和《军统内幕》中有所披露，但真正涉及到我个人罪恶生涯的并不多。与一般人相比那 18 年的军统生涯也可谓是曲折离奇的了。然而曲折也罢 离奇也罢 我毕竟是当时社会的产儿 绝非天生怪物。

说实在的 我在刚刚懂事 即上小学、中学时 也曾立志要做个热爱祖国、能为人民做些好事的人。但家庭、社会、环境以及自己的个性、品质等等复杂原因 竟使我从 18 岁起就开始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生涯。

不少人常来信或当面问我：你既不是黄埔学生，又不是蒋介石、戴笠的同乡 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初中生 怎么能在 28 岁就当上国民党军统少将总务处长了呢？问者可以脱口而出，答者可就不那么轻松了。这个问题，正是在写文史资料时羞于说出也无法三言两语说清的问题。过去，我对于上司指派我干的罪恶活动，往往还敢于揭露出来告诸读者，因为那是奉命而为。可是出于自己私心，出于欲求升官发财的意念而犯下的罪行，就难于启齿了。

1961年2月21日敬爱的周总理接见第二批特赦战犯时曾当面指示我，要我把过去的所作所为、亲见亲闻如实地写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成功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遵照总理的指示，我虽然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出于私心，我并没有把全部都写出来，每思此事，“汗未尝不发背沾衣”，觉得愧对总理。

前年我70岁了寿辰之日我曾即兴赋诗以自勉诗曰：

古稀今不稀，盛世多期颐。

报国献余热，无鞭自奋蹄。

我反复考虑，觉得只有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见不得人的往事公之于世，才对得起周总理的教导，百年之后，才有面目去向周总理汇报。我决心讲述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后人了解旧社会的黑暗，了解旧社会对青年的毒害、腐蚀以及统治者的反动、腐朽，从而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共产党的伟大，激发起更强烈的爱国热情。

现在我因年迈多病，无力胜任长篇回忆录的写作，只好把事情讲出来，由我女儿整理成书，用它来作为我对往事的忏悔，作为后人的反面教材。如果这本书能对读者有一点好的作用，那也算是没辜负周总理对我的教导和期望。

由于事隔多年，我解放前的全部日记又在云南和平解放时被通通搜去，迄今未能领回，许多回忆可能与事实有出入，尚请知道当时情况的读者，随时给予纠正补充。因为这不是一本小说，而是一本回忆录，应力求真实。这是我向读者最诚恳的请求。

还有，此书出版前夕，有几位我一向最尊敬的前辈和社会知名人士，曾表示愿为此书题写书名或作序，而我不敢玷污他们的笔墨，更怕有损他们的威望，但这种深情厚谊和对我的鞭策、鼓励，我将刻骨铭心，永远感激，特在此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第一章 误入歧途

湘江水宽阔浩荡 碧波滚滚 浏阳河迂回曲折 清漪粼粼。这两条美丽如画的故乡水啊 曾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然而 她也养大了一些像我这样的不肖子孙。此绝非故乡水有何偏爱。她是圣洁的、慈祥的 宛如慈母用同样的乳汁 喂养着自己的每一个儿女。

说来 读者也许不相信 少年时代的我 也曾像故乡水一样淳朴。

北伐战争时期 叶挺独立团攻克长沙、岳州等地 军阀吴佩孚逃往河南郑州。北伐军开进长沙城之际 城内城外 欢呼声、鞭炮声震耳欲聋 举城民众夹道欢迎。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蹦蹦跳跳地跟在队伍旁边 跑前跑后 端茶递水 在剪着短发、身着灰色军装的女兵中，寻找着自己的姐姐。他知道姐姐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又进了武汉军分校，此时正在北伐军中做随军医生。

他多么羡慕那些威风凛凛的北伐战士，多么希望能像姐姐一样跟着部队去冲锋陷阵啊 可惜他年岁太小 只会举着小旗跟着大人呼口号 只会把同学领到自己家去 冲着父亲高喊“打倒土豪劣绅”！

他为姐姐参加革命部队而自豪 为父亲靠房产、地租生活而羞耻。

“马日事变”前夕 他亲眼看见何键、许克祥手下的长沙警备司令危宿钟 从乡下窜回城来 在城门口得意地扬着马鞭说：“哼，

老子又回来啦 看这回有多少人头落地吧！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久之后就看见，一批批他曾很敬佩的农会干部、革命党人经过他家门口，被押往浏阳门外的十字岭刑场处死。他曾偷偷地为他们哭泣，为他们不平。

1932年初，他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因跟高年级同学一起闹学潮，被开除出校门。社会的压力、父亲的咒骂，并未泯灭他对革命的向往。他不愿像父亲一样过寄生生活，毅然决定弃家出走，去上海投奔姐姐、姐夫，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民族做出一番事业来。

那个少年就是我，那时的我是多么天真、单纯啊，慈母的乳汁在我身上同样化成了一腔热血。

当时，有一艘英国怡和公司的小火轮客船从长沙直开上海。我买了张统舱船票，用布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就决然地离开了家门，甚至没有去向父亲辞行。

客船徐徐离开了长沙大西门码头，我心里骤然感到一阵慌乱。然而母亲的慈颜、父亲的威容，都随着客船的前进渐渐远去了。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青年，就这样开始走向社会，踏上了人生的征途。社会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不过，我相信姐夫，一想到有他在上海，心情就舒畅多了。

姐夫余乐醒是我那时最敬佩的人。他曾去法国参加过勤工俭学，又去苏联留过学，而且北伐战争时，他任叶挺“铁团”的团教导员……仅凭他的经历，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何况姐姐曾来信说，姐夫在上海也混得不错呢！我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决策是对的，有姐夫这样才学兼备的亲戚栽培，难道还怕干不出一番事业来吗？

客船在碧绿的湘江上行进着，激起朵朵白色的浪花，岸边山上的红叶，如同片片绚丽的彩霞。我渐渐陶醉在家乡壮美的山水之间，忘却了离愁，忘却了烦忧。

船顺着湘江口驶进长江。江面渐渐开阔，波涛汹涌，浪花拍打着船舷，景色更加壮观。我从船头跑到船尾，从甲板登上顶舱，尽情

地观赏浩瀚的长江，极目眺望那水天一线的远方。

“滚下去 [country man (乡巴佬)]”一个声音呵斥道。

转身一看，一个黄发碧眼的外国海员正怒目圆睁，双手叉腰站在我身后，仿佛我偷了他什么东西似的。我知道这头等舱住的大多是外国人，可是我在这里看看祖国的长江又有何妨？真想争辩两句。转念一想 尽管是在自己的国土上 但坐的是外国人的船啊 初次出门何必惹是生非？我郁郁不乐地走下舷梯，方才的雅兴一扫而光。

“哐啷！”没走几步，一个东西从上面飞落到甲板上 我吓得本能地往后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个贴着外国商标的空罐头盒。再一抬头，刚才骂我的那个外国海员，正在上面得意地哈哈大笑。两个妖艳的外国女人站在离我不远的甲板上，见此情景也笑得前仰后合。我觉得仿佛有人猛地扇了我一个耳光似的。我狠狠地瞪了那俩外国女人一眼，一脚把那空罐头盒踢进长江。说心里话，我真想连他们一起踢进江里。但理智告诉我，外国人是不好惹的，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呢！临行时母亲一再叮嘱我说：“在外面不要惹是生非，要好自为之。忍得一时之气，免去百日之忧……”我也只好强咽下了这口窝囊气。我想 这都是因为国家太不强盛了 否则 外国人怎能在这里逞凶霸道啊！

好不容易才到了上海。正如姐姐信中所说的那样，姐夫确实混得不错 漂亮的洋房 华丽的摆设 可比父亲的‘沈家大屋’阔气多了。看到这些，我对姐夫的敬佩又增添了一成。我认为这才叫本事呢！靠自己的才能挣下家业，而不是像父亲那样靠祖产、靠地租过寄生生活。

其实，我哪里知道，此时的姐夫已完全不是北伐时的姐夫了。“四一二”之后，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从革命队伍里一个跟头栽进了反革命的巢穴。他与父亲所不同的是，一个在幕前，一个在幕后；一个赤裸裸，一个戴着假面具而已。这时的姐夫已成为复兴社

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而我却仍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

初到上海 姐姐、姐夫让我先玩几天再找工作。我便骑自行车到处闲逛。上海可真大 鳞次栉比的高楼、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看得我眼花缭乱。我想，这下可真是大开眼界了。然而让人心里憋气的是，上海租界林立，如同我所乘坐的英国怡和公司的客轮一样，外国人在这里同样是趾高气扬。更令人吃惊的是 听说不久前 外滩公园门口还有块‘华人与狗 不得入内’的牌子 我越想越生气。为什么在中国的国土上，外国人能如此作威作福 侮辱我们呢 当时 我可真不明白。现在我才懂得 这些反常的现象，都是政治腐败、技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啊！

半个月后，我又一次催姐夫，让他介绍我参加革命工作。姐夫漫不经心地笑了笑 说：“你口口声声喊要参加‘革命’ 你懂得什么叫‘革命’吗？”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我搔着后脑勺 憨笑地盯着姐夫说：“革命？革命不就是像你们北伐那样吗？”

“对！北伐战争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它打垮了认贼作父的旧军阀，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不过，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革命任务。现在旧军阀打倒了，但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上秩序很乱，各党各派彼此争斗很激烈，随时都可能再度出现割据的局面。你还年轻，有些问题一时也很难说清楚，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如果你想参加革命的话，那我就向上面反映一下，先在我这里当交通联络员吧，我这里正需要人呢！”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姐夫的议论。没想到姐夫话题一转，竟这么痛快地答应留下我。我高兴得从沙发上蹦起来，拉着姐夫的手喊道：“姐夫你真好！一言为定 你要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姐夫这次反而没有笑。他轻轻地把我按回沙发上，郑重其事地

说：“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参加这个组织，首要一条是严守团体秘密 对任何人 包括父母、妻儿、好友都不能泄露 否则是要受纪律处分的。另外 就是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 参加了这个组织，就不能任意退出；不能擅自结婚，要结婚也必须经团体审查，批准才行。还有一条，就是这个工作有时是要冒危险的，没有胆量可不行 给你三天时间 好好考虑考虑 想好了再找我 填份简历表，免得日后怨我这个做姐夫的没交代清楚。”

说实在的 当时我刚刚 18 岁 正是乐于冒险的年龄 越是神秘的事情越是想去做，于是当即就向姐夫要了张简历表。我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踏进了军统的前身——蒋介石亲任社长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一个被人们称为“魔窟”的团体 开始了我的特务生涯。

古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首已百年身。”今天 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啊！

当上联络员后，我化名陈沦，主要任务是给姐夫所管辖的法租界、英租界、华界及沪西的四个情报组、一个行动组和几十个直属通讯员递送文件，取回情报。

有一天，姐夫叫我往杭州去给戴老板送封信。我知道，“戴老板”就是特务处长戴笠。在当上交通联络员的几个月中，经常听人说到他，大多数人都很惧怕他，我也不免有些紧张。

当时，复兴社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戴笠兼任特派员 经常去那里办公。到了警官学校 我交出姐夫给我的信 就有几个卫士把我送到戴笠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一个身着灰色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打电话。有人悄悄地告诉我说，这就是戴老板。我借着他打电话的机会，仔细地打量他。他中等身材，长方脸显得有些过长，嘴巴又宽又大，除了那双眼睛和又粗又黑的剑眉让人望而生畏之外，其他都很平常，不像那些人所说的那么可怕。

打完电话，警卫向他报告说我是上海特区派来送信的，并连忙毕恭毕敬地双手把信递给他。他微笑着打量着我，边拆信边问：

“你是新来的吧？”我机械地点了点头。他指了指沙发，示意我坐下，然后匆匆地看完信，就坐到我旁边，和蔼地询问我个人和家庭的情况。

看到他对待我那么和气、亲热，我便毫不拘束地把情况告诉给他。他边听边点头，鼓励我往下说。当我谈到自己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他哈哈大笑起来，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了出来。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他越说越上劲，索性站起来，双手叉腰说：“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做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你很幸运啊，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啊！”

他跟我谈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掏出 100 元钱，让我在杭州玩玩，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你就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戴笠待我的态度，简直让我受宠若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待我这么好。回到上海，我把情况告诉姐夫，姐夫也很奇怪，他说：“戴老板这么喜欢你，这可真是难得啊！说不定戴老板有心要栽培你呢！”

多少年来，我一直也不明白戴笠为什么第一次见我就待我那么好。现在我才懂得，当时复兴社刚成立不久，他急需要有自己的人手和心腹，可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大都各有自己的一套打算，思想很复杂，有些人资历比他还老，而我则是初出茅庐，年轻、单纯、可塑性大，完全有可能培养成他的忠实门徒。

果然如姐夫所料，第二年，也就是 1933 年 5 月，戴笠就提拔我当了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

情况是这样的：原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徐昭俊，常常情报不实，

戴笠便怀疑这个共产党的脱党分子又与该党发生了联系，命令姐夫派人把他押送南京。姐夫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去完成。

徐昭俊是黄埔三期毕业生 懂军事 会打枪 而我当时除送信跑腿外什么也不懂 连枪也没摸过 怎么能把他押到南京呢 姐夫灵机一动 出了个主意 他写封信让徐昭俊拿着 说是我犯了“团体”纪律 让他把我押送到南京。当时徐昭俊很高兴，一路上总是盯着我 生怕我跑了。实际上 我怀里也揣着一封押送他的信 也在暗中盯着他。当火车开到南京车站时 戴笠早已派了认识我的人开着一辆专门抓人的小旅行车在站台等候。

下车后 接站的人跟我握了握手 却没人理他 只是示意他上车。他忙指着我向来人悄悄地说：“他是送来的犯人！”我心里觉得好笑 可因为他还没上车 怕他借旅客多的机会逃跑 所以仍然装着什么也不知道 随同他一起钻进了汽车。车开到特务处秘密监狱附近的北门桥时 停了下来 来人从我手里接过信 就让我下车了，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是不许进入监狱的。

徐昭俊一见我下车就有点急了，冲着车里其他的人嚷道：“他是犯人 他是犯人 怎么把他放了？”

车里的人冷笑道：“没错 没错 押来的是你！”说着还把头伸出车窗 笑着对我说：“没你的事啦 你回去吧！”

我高兴地点点头。

我为自己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而得意，立即跑到鸡鹅巷 53号戴笠在南京的办公处去看他 希望得到他的夸奖和赏识。我把自己押送徐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向他做了汇报。他高兴地夸我能干 并当即写了一个条子给我姐夫，让我代替徐昭俊担任法租界情报组组长。

听到这个决定，我着实吓了一跳。情报组的情况我是了解的，组员的成分很复杂 不仅年龄都比我大 而且阅历都比我深 有的是黄埔学生 有的出身土匪 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十几岁的小青

年怎么能管得了他们呢？

我连忙又摆手又摇头地说：“不行 不行 我怎么能管得了那些人？”

戴笠见我那副着急的样子 反而笑了起来 说：“怕什么 他们又不吃人 多动动脑筋嘛 要想让组员信服你 首先你自己就要学会一套搞情报的方法 对组员要奖惩分明 恩威并用 特别不听话的，还有团体、纪律嘛 我这是给你个锻炼的机会，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听他这么一说 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内心深处虽然十分感激他对自己的栽培 可一想到组里的成员和情报组的任务 不免又有些苦恼，恐怕自己的无知无能会有负于他。

情报组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着重收集刺探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情况外 还要收集其他反蒋势力的情报 并了解地方军阀派往上海的代表人物的活动情况，如有关两广的陈济棠和李济深、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等方面的情报。这使我错误地理解 共产党和新旧军阀 都是想与国民党蒋介石争夺地盘 想再度造成北伐前那种军阀割据的局面。特别是在北伐时与国民党平分秋色的共产党 现在居然在江西、湖南一些地区开辟了根据地 这真是大逆不道。我竟把“马日事变”时自己亲眼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为了不辜负戴笠的栽培 不辱没所谓“革命先锋”的称号 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情报组长当好。我一方向组里的组员请教 另一方面冥思苦想地寻找刺探情报的门路。

不久 我发现上海常常发生火灾 救火员可以爬房顶 自由地进出受灾者的家 而且还有所谓的“业余消防队”，一般人都可以报名参加。于是我自己买了套救火员的服装 自愿报名参加了“业余消防队” 哪里有火灾就往哪里跑 不过不是为了去救火 而是“趁火打劫” 企图从受灾者家里寻找到有用的情报。

可没过多少日子，我就发现自己这个办法实在太笨了，不仅很难发现什么有用的情报，而且弄不好还有被烧死的危险。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好机会。

一天，我正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发现与我同桌的一个青年说着一口地道的湖南话，一问才知道，他是湖南湘光通讯社的记者，被派到该社驻沪办事处工作。我突然灵机一动，跟他拉上老乡，并对他说：“我给你们当个义务通讯员怎么样？不要报酬，只要你们发给我个记者证。我有了新闻材料，一定发给你们通讯社。”对方听我这么一说，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从此，我对外的公开身份就成了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化名陈仓。有了记者这块招牌，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挎着个照相机出入各种场合，收集情报了。

渐渐地，我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多了。我除了可以自由地参加各种文艺团体的集会外，还可以自由地去采访某些会议代表或知名人士，从而窥察他们的思想动态。姐夫和戴笠也没想到我如此能钻营，对我的工作很赏识。我也为自己的“才干”而自豪，却毫不知正是这种撒旦式的才干，使自己在罪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第二章 十里洋场

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魔鬼的天堂。我虽到上海一年多，但对上海社会的实质仍是知之甚少。当了情报组长后，办公室就设在法租界那里烟馆、妓院、赌场比比皆是。在这段日子里我可真的大开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初到情报组，组员们大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表面上敷衍我，背地里各行其事。只有一个叫黄漫芝的内勤人员待我还不错，闲来无事，他就把组里的情况告诉我，有时还带我出去玩。烟馆、妓院，我认为只有自暴自弃没出息的人才往那里跑，我是断然不肯去的，而赌场我倒很想去看看。

一天，黄漫芝领我去附近一家赌场闲逛。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去买筹码，而是领着我一直往里走，不但没有人拦阻，反而有人迎上来笑着打招呼。

赌场门面虽不大，里面可不小，除了各种方式不同的赌博场地外，还有供赌徒们吃饭、休息的地方，不进赌场是很难看到这种场面的：赌台四周的人，大都像饿鹰似的，神色紧张地盯着那转动的轮盘或骰子，赢了钱的兴奋得两眼发亮，红光满面，热汗腾腾，还想着再赢再赢；输了钱的则急得眼睛发绿，面色晦暗，冷汗淋漓，恨不得嗓子眼里都要伸出手来，把输掉的钱捞回来；而围观者则无动于衷，就像是在欣赏一场猴戏。看了一会儿，我就拉着黄漫芝往外走，只见门房正往外推搡着一个没穿上衣的男子，说：“输了衣服算

啥 回去拿了钱再赢回来嘛 站在这里有什么用？”

赢者贪婪的目光 输者绝望的神情 围观者冷漠的态度 都使我
觉得不舒服。打那以后 我再也不愿去赌场闲逛了。可是闲得没
事时 总得找点什么消遣啊 于是我就寻找了一些自认为比较正当
的娱乐 如打网球、游泳、骑马等。

想不到 上海的怪事真是太多了 只要走出家门 随时都可能
遇上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刚参加了骑射会不久 有天早上 天蒙蒙
亮 我就去外面跑马。我正骑着马在一条新开的、尚未竣工的公路
上奔驰时 突然发现半山坡上伸出半截棺材头 上面的木板还在活
动。我向来不信鬼神 但看到棺材板在动 也不由得有些惊诧 就立
即下马 握着手枪走过去 想看个明白。谁知 棺材头的木板推开
后 从里面爬出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小伙子 手里还端着一把
咖啡壶。他见了我就用熟练的中国话说：“早上好 请跟我一起喝杯
咖啡吧！”他的爽快和热情一下子吸引了我 我毫不犹豫地把手枪
放下 坐下跟他聊了起来。

原来他是一个白俄青年 父母死后 无钱租住房子 发现这个
地方很幽静 就把棺材里的尸骨拖出来 把里面打扫干净 每天晚
上都睡在这儿。白天 他有时出去打短工 有时穿着整齐 像个阔少
爷 去偷、去骗 只要能搞到钱 什么都干。他还得意地告诉我说 住
在这里既不怕人偷 又不怕人抢 比住在高楼大厦里还“舒服”。他
每天出去就把个骷髅头放在棺材边上 一般人不会走近 就是小偷
对此也不会感兴趣，所以他不用担心放在棺材里的咖啡壶和生活
必需品丢掉。我想 如果利用他收集些情报倒也不错。我们就这样
认识了 我总是叫他“毛子” 他也毫不在意。

不久 有几个新认识的青年约我去苏州、杭州游玩 我顺便邀
了毛子一起去。他倒很爽快 说：“只要你管饭 去哪里都行。”同行
的共五六个人 大都是西服革履 衣着整齐 只有我的这个白俄朋
友，刚刚三四月份却只穿着衬衫和短裤。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的美景真是名不虚传。那清雅多姿的苏州园林，那潇洒飘逸的杭州西子湖，确实妙不可言。遗憾的是，游览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却大煞风景。

那天，当我们几个人兴致勃勃地来到苏州虎丘，登上一个约三四层楼高的山崖时，远处带状的小溪，依依的垂柳，近处盛开的鲜花、碧绿的草坪，尽收眼底。突然，同伴中一个大腹便便的阔少说：“这儿可真高，谁敢从这里跳下去，我送他 100 块钱。”

“说话算话？”毛子急不可待地问。他大概长这么大也没有过这么多钱。

“钱就在这里，你敢吗？”阔少得意地一拍衣兜。我尚未来得及制止，那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已经嗖的一声跳了下去。随着一声惨叫，他坠落崖下。我们忙探头张望，只见他正抱着一条血肉模糊的断腿在草坪上打滚。

我们跑下山崖，看见他的一条小腿无力地耷拉在一边，骨头都露了出来。他面无人色，满头大汗。我忙去扶他，他却伸出一只惨白而颤抖的手对阔少喊道：“钱，钱，拿钱来！”

这件事比赌场的情景更使我震动。前者拿运气做赌注，后者拿生命做赌注，这都是为了钱啊。钱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我想，一年多以前，自己负气离家出走，若没有姐夫的帮助、戴笠的提拔，是不是也会堕落到他们那种地步呢？想起来不禁有些后怕。此时，我又想起了在浦东区看到的一件事情。

一次，情报组的一个组员得到情报，说在上海浦东区工人村，共产党正召开秘密会议，区长便决定行动组前去搜捕。我因初上任不久，对什么都感到新鲜，也就跟着一起去了。特务们赶到那里时，被一个在村口望风的年轻工人发现了。他知道特务也看见了他，转身就往村里跑，边跑还边喊了一声。一个特务一枪打在他腿上，他摔倒了，特务们一拥而上抓住了他。可是当特务们包围并冲进开会的地方时，与会者早都从敞开的窗口跑走了。这个会场就是这个年

轻工人的家。他家的房子跟其他工人的一样 又矮又小 不同的是他是单身，室内除了一张破木板搭的单人床和床上那鱼网般的棉花套外 还有几把破木板凳 大概是借来的吧 墙角还有一个只剩几粒米的小陶罐。看样子他跟我年岁相当 但是比我显得粗壮。在往回押解的路上 我出于好奇 禁不住问他：“你看 你跟共产党闹了半天 结果还是穷成这样 你这是何苦呢？”

他不屑地白了我一眼 说：“跟你说 你也不懂 这是革命！”

“革命？”我不觉心头一震 心想 姐夫和戴老板都说我们是在干革命 这个同龄人也说他在干革命 我们的“革命”有钱有官 冠冕堂皇 而他的革命 缺吃少穿 杀头坐监。相形之下 我觉得还是我们的“革命”合算。

想起这件事 我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我不愿像赌徒那样靠运气发财 更不愿像毛子那样用命去换钱 当然也不愿像浦东那位同龄人一样 贫困潦倒 家无隔夜粮。想到这些 我更加欣赏、珍爱自己已获得的地位。但我也清楚地知道，要想维护自己现有的地位 也是很不容易的。一年多来 我看见不少同事因工作疏忽而受处分 我的前任情报组长 仅仅因为戴笠怀疑他有“通共嫌疑”就被关押。一个人要怎样去做才能巩固、提高自己已有的地位 平步青云呢 很快我就找到了答案。

自从毛子跳崖之事发生后，我再也不愿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出去游玩了。我自己买了支猎枪 到哪里去玩都把猎枪一背 边打猎边游览 别有一番情趣。

这天 我因公去浙江 顺便到普陀山游玩。当时正值香火旺季，善男信女们三五成群地到山上寺中烧香、还愿 听法师讲经。山上苍松翠柏 林中庙宇飞檐 念经声阵阵 木鱼声梆梆 人人的表情都是那样虔诚、肃穆。这是一个多么圣洁、幽静的地方啊 我信步来到庙中 想看看香客们如何磕头作揖、顶礼膜拜。

路过讲经殿时，看见一群佛门信徒正虔诚地坐在蒲团上聆听

法师讲经。这位法师年纪并不大约 40 来岁，身着袈裟，光头危坐，犹如一尊佛像，显得神圣、庄重。真怪，这法师怎么这么面熟，在哪里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于是我也加入信徒们的行列，坐下来听他讲经。他讲得头头是道，声音悠长悦耳，真像是从上传下来似的。讲罢，他说：“各位居士明天请早。”信徒们便纷纷离去。我仍坐在那里不走，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忙走过来，笑眯眯地冲我一合掌说：“阿弥陀佛！朋友，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这下我才想起来，他曾跟我做过邻居。

我当情报组长之后，曾住在英租界静安别墅一个白俄老太太开的公寓里。这所公寓环境很幽静，里面住的都是单身的男子汉。胖胖的白俄老太太做得一手很好的俄国菜，她不仅出租房子，而且包饭。在这个公寓里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中年人，他衣着整齐，风度翩翩，戴一副玳瑁眼镜，很像个学者。他和气而又寡言，从不与邻居们来往，有时在餐厅、楼道碰见了，他也只和善地笑着点点头，很少说话，连房东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出于好奇曾偷偷地跟踪过他，发现他在上海除了吃喝玩乐、和漂亮女人跳舞外，从不干正经事。我想他大概是海外某阔佬的公子吧，否则谁又能像他那样逍遥自在呢？

我望着面前这位身披袈裟已摘掉了眼镜的邻居，实在迷惑不解。他什么时候出家了呢？他从我眼神中看出了我的疑惑，就拍拍我的肩说：“老弟奇怪吧，来到屋里坐坐，我慢慢告诉你。”

他的卧室与其他出家人一样简单、朴素。他从床铺底下拿出几听贴着素菜商标的罐头和一瓶上好的白酒请我。我不喝酒，只夹了几筷子罐头菜，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素罐头里面大都是荤菜。他一边吃喝，一边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他父母早亡，是在南洋经商的叔叔供他上了大学。他原以为发奋读书就能有所作为，所以读书很刻苦，是上海工科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他因国内没有靠山，始终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便想

去南洋找叔叔，可是年迈的祖母无人照顾，他苦闷极了。闲居在家时，看见祖母整天烧香念经，出于一时的好奇，他顺手翻看了一下祖母的佛经，并问祖母是否明白这其中的意思。祖母告诉他说，很多都看不明白，但寺里有时会花钱请来高明的经师给讲解，所以多少懂得一些。祖母的话给了他很大启发，他便开始潜心研究佛经。凭着他的聪明和才识，他很快就当上了经师，每年香火旺季，他就到各名山古寺去讲经。

他讲着讲着渐渐激动起来，也许多喝了两杯酒的缘故吧，他的话语变得异常激奋。他说：“在如今的世道上，知识才学有什么用？社会不需要你。老老实实地做人，就无立足之地。我要生活、要吃饭 我不能靠叔叔一辈子。我自己没有后台 没有钱财 要想自立就得弄虚作假 或者是投人所好 或者去制伏别人。不过 我没本事制伏别人，只好放弃我的学业，投人所好。现在我讲经，信徒们爱听，各得其所。我每年讲三个月的经，就能挣够我一年的花销。其余九个月 我就往上海一住 袈裟一脱 西服一穿 凡人一个！”说完他又哈哈大笑起来 对我一举杯 说“喝 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后一仰脖，把酒一下全倒进嘴里。

告辞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躺在床上辗转不宁，无法入睡。赌徒的眼睛、毛子的断腿、浦东工人的破被、邻居的袈裟 都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赌徒的道路太悬，毛子的道路太蠢，浦东工人的道路太险，那么邻居的道路呢？我说不出来。可我觉得他所说的投人所好和制伏别人的手段，倒是可以兼而用之的，我自信有这个能力。从此，我决心把这两种手段运用到工作中去，因为我不愿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无立足之地。